

巴金读本



● 中学生文库 ●

ZHONGXUESHENG WENKU

2

●

BH43124

I217.2
281
3

巴金文集



巴金文集

巴金读本

陈丹晨 编选



B 448409

责任编辑 曾加乐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巴金读本

陈丹晨 编选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8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海安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本

统一书号: 7150·3971 定价: 1.85元

一颗燃烧的心

——向青年读者介绍巴金

一、爱，人生道路的起点

巴金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漫长的文学生涯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同走过来的，丰富而又坎坷曲折。

巴金出生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不久，清帝国被推翻，从此中国结束了帝制。但是，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礼教传统在中国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始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他出身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庭。巴金的童年是在温馨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的。母爱对于他是幸福、温暖而难忘的。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常

常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使他懂得了要去爱一切人，要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同情怜恤那些不幸的人。

这些泛爱的思想象一颗种子播植在幼小的巴金心中，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上的起点。巴金曾经怀着无限深情回忆道，“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母亲”。

但是幼小的巴金也曾在他家的院墙内看到另一种悲惨的人生。他父亲在清帝国最后几年曾在四川北部广元县做知县^①，巴金常常看到慈爱的父亲铁青着脸审理官司的情形。父亲命令如狼似虎的衙役痛打乡民。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乡民还要忍痛叩头，感谢县官老爷打板子的恩典。李公馆的许多男女佣仆也常因为某些过失而被责打。有的因此被撵逐出去，沦为乞丐，有的因为受诬陷，愤而自缢。平时，巴金喜欢到公馆的马房里，和轿夫、佣仆们在一起玩，甚至躺在他们的破床上，看他们打牌，听他们讲述各种古怪的故事。他渐渐了解、熟悉了他们的痛苦的人生。于是，他的脑子里不时生出许多疑问：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竟是那么幸福享乐，另一些人竟是那么不幸苦痛；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便打人，另一些人只能随时挨打。就在那些有着悲痛身世的轿夫中间，有人却真诚地告诫他：“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① 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但那时的知县是一个县的行政、司法最高的首长，所以要直接审理官司。

巴金在这个家庭里还目睹许多年轻女子在封建礼教专制下受苦、挣扎，最后终不免一个个失去了美丽的青春和生命。有一位表姐是抱着死去了的未婚夫的灵位成亲的。还有许多亲属中的少女也都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象一朵朵过早枯萎的鲜花寂寞地死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个封建大家庭，他愈来愈觉得苦闷窒息而难以忍受，因而在精神上愈来愈疏离、厌烦。他宁可和佣仆在一起，感到更为亲切、温暖一些。有一次，当全家人欢天喜地过除夕的时候，这位李公馆的少爷竟然躺在阴冷脏污的马房里躲过了人们的寻找。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爆发了。各种鼓吹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书报和文化革命的新消息不断传入偏僻的四川。当时巴金只有十五岁。他那热烈而又寂寞的心一下子被这把烈火点燃了。他怀着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和惊喜的心情去阅读这些新书报。只要是反对旧的、封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他都高兴地吸收。这些书报中所宣传的许多新思想，都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这个长期被禁锢的年轻的灵魂。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政治小册子《告青年》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号召人们去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激昂呼喊；波兰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中描写一位俄国青年革命者反对专制统治去暗杀总督，正是他的恋人向他发出行动的信号，从而壮烈牺牲。这种种无畏的献身精神都给巴金深刻的影响。他流着

热泪反复阅读这些书籍。他好象从中看到，一个幸福的新社会将会与明天的太阳同时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即消灭。

少年时代的巴金还曾热情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编刊物，写文章，发传单，反对军阀统治。为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找献身革命的机会，一九二三年，他和三哥李尧林一起离开四川老家，来到上海、南京上学。当时，这些地方正是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风暴的中心，也是外国殖民者和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最为严酷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连续枪杀中国工人，引起了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斗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正在南京读书的巴金也参加了学生的声援运动。他对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凶恶的罪行感到极端的愤慨和痛恨。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巴金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和追求。

二、写作，为了申诉自己的悲哀

一九二七年一月，巴金满怀着忧郁和苦闷，告别了祖国，去到法国求学。当他踏上邮船时，他喊出这样悲苦的，然而充满着眷恋祖国之情的声音：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巴金在法国住了两年，并未正式进大学学习。每天清晨，他到卢森堡公园散步，白天闭门看书，晚上到夜校补习法文。本来就已苦闷的巴金，如今在这陌生的异国，又在这样孤寂的环境里消磨时光，更加忧郁难耐。巴黎是一个繁华的世界，但对这个穷学生来说是毫不相干的。晚上，他从夜校归来，在被小雨打湿了的僻静街道上踽踽独行。他仰望着矗立的巴黎圣母院的古老钟楼，那悲哀的钟声沉重地敲在他的寂寞心上。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铜像前，他看着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思想巨人，多么想把自己的苦闷向他倾诉。那时，他正在大量阅读和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他敬仰这些启蒙思想家，钦佩他们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的精神。如果他能够开口对他说些什么，那该多么好啊！

过了一些日子，国内发生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革命党人的事变，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在这同时，两个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者樊塞蒂和萨柯在被美国政府诬陷为抢劫罪而关押了六年之后要被处死刑的消息传来，在法国引起了公众的义愤、声援和抗议。樊塞蒂的思想深深打动了巴金，樊塞蒂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正是巴金执着追求的。樊塞蒂在给巴金热情的回信中充满了对生活对人民的挚爱。后来，他从容走上电椅就

义。当巴金听到樊塞蒂和萨柯被害的消息时，他感到窒息和绝望，他几乎愤怒得快要疯了。从此，他久久不能忘却樊塞蒂。他在后来写作中许多次提到他，写到他。巴金称樊塞蒂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位“先生”。

在巴黎，巴金还曾与流亡在法国的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革命者有过交往。他还读了许多西方著名的哲学和历史著作。法国和俄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革命传统，许多革命家的献身精神强烈感染着他。他开始写作一本俄国著名女革命家的传记。几年之后曾结集出版，名为《俄国十女杰》。其中苏菲亚、妃格念尔等一直是巴金崇奉的精神楷模。她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励着巴金，并通过巴金的作品鼓舞中国青年。他感到自己好象与法、俄两个国家的人民一起经历了这两次大革命，滋生了勇气。

不久，巴金因为肺病复发，移居巴黎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休养，过了一段安静恬适的生活，使他长久以来的悲苦心情得到了暂时的舒缓和休息。居住在巴黎时开始动笔的小说写作又继续进行了。在上海每天可以看到的各种惊心动魄的社会惨剧重又涌现在他的眼前。他的苦心思考和探索，他的复杂的悲哀的感情都尽情地宣泄在这本小说的写作中。这就是巴金在一九二八年夏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他还说：“我不是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为了申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巴金把书稿寄给国内一位朋友准备自费出版，但那位朋友交给当时影

响最大的著名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读后决定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四月号连载发表。这个无名作者的作品一下子竟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和注意，纷纷探问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强烈反响鼓起了巴金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位杰出的作家。这是他自己从未想到过的。

三、文学，与我们的土地 和人民永远相连

一九二八年底，巴金回到祖国，继续忙于哲学理论和外国历史故事的著译工作。当他重新从事小说创作，已是一九三〇年春夏。开始的时候，他连续写作了许多以法国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房东太太》《洛伯尔先生》等，内容有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的混乱和贫困，有写低层人民的不幸爱情故事，有写革命者的流亡生活的。虽然他写的大多是外国人的生活，但巴金认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的、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

三十年代前半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期。他几乎日夜不停地写作，忘了疲倦，忘了健康，没有娱乐，没有休息。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约八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以惊

人的毅力和勤奋，写作了共约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间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写作了八十多万字。许多著名的代表作，如《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爱情的三部曲》《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神》《鬼》《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一九三六年是他最忙的一年，又编刊物、办出版社，又做作家、翻译家，既要自己写作、翻译，还要看别人的稿件，核校书刊的校样，每晚都要忙到半夜二、三点钟。

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多事之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中国东北，一个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的爱国救亡运动遍及全国。巴金热情参加了这个爱国热潮，而且还怀着悲愤的心情写完了《家》。《家》是一边写一边在上海时报上连载的。《家》的发表轰动了文坛，特别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一九三二年初“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偷袭上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上海的战事进行了一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彻底炸毁。巴金新作《新生》的稿本和载有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也在这次浩劫中被毁。那时，巴金本在构思写作新作《海的梦》，因为“一二八”事件的发生，他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把《海的梦》改写成揭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的故事。作品中洋溢着反帝爱国的情感和战斗的呼喊，文字

流畅清丽，因而为当时青年学生所爱读，有的还能成段背诵其中的内容。《新生》稿本被毁后，他冒着七月炎夏酷暑，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汗流浹背，日夜重写，化了半个月时间，重新写完了这部十万字小说的第二个稿本。他把这次重写的小说看成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证明进步文化是“炸弹所不能毁灭的”，并将“永久存在下去”。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巴金又连续写作了两部反映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雪》。后者取材于他在浙江长兴煤矿的一段短暂生活经验写成的。长兴煤矿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煤窑。就在巴金去访问之前的一个多月，刚刚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巴金在那里看到了煤矿工人悲惨的遭遇，猪狗不如的生活，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成了他想学习法国作家左拉写一部中国的《萌芽》^①的根源。《雪》描写了工人群众不堪忍受压迫，奋起进行武装反抗的场景。这在当时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多见的。

《雪》原名也叫《萌芽》，但出版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巴金不甘屈服，就将小说中的人物改名换姓，重写结尾，改书名为《煤》重新出版，又一次遭到禁止。巴金却决心要把反抗的声音传播到群众中去。于是，他自费买下了《煤》的纸型，改名为《雪》，通过书店秘密发行，以避开统治者的注意。就象一九四七年他在给《雪》的日译本写序时所说的那样：小说中的暴动失败了，好象“雪盖住了火山，

^① 《萌芽》，左拉(1840—1902)所著的小说，是一部著名的描写矿工生活的作品。

但是火种并未消灭。”作者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

三十年代前半期，国民党统治者箝制言论，对书刊出版采取严厉的审查禁锢的政策。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电》就描写了这个黑暗年代里的低沉压抑的气氛。革命青年为了反抗这种反动统治，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象在漆黑夜空中的电光，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样的作品在刊物排成校样还未来得及正式出版前就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抽掉了。巴金却将稿件从上海转寄到当时的北平（今北京），另化笔名，改了书名，并在作品末尾托称作于“九龙”。这都是用来迷惑检查官耳目的手法，使人既不至怀疑到真正的作者是巴金，也想不到这是一篇已经遭禁的作品。这样终于战胜了愚蠢的检查官，《电》还是和读者见面了。

抗战初期，巴金热情地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和平时写作一样，他总是脚踏实地工作着。他和茅盾等一起发起筹办了一个宣传救亡运动的文学刊物，名为《呐喊》，后改为《烽火》。这本刊物规模虽然不大，印刷装帧也很简陋粗疏，但却得到广大作家支持，纷纷为它义务写稿。刊物洋溢着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喊，因此极受读者欢迎。不久，上海陷落，这个刊物也不得不被迫停刊。顽强的巴金并不因此气馁。到了第二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进行筹办工作，使《烽火》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得以在广州复刊。

在那些日子里，巴金废寝忘食，惨淡经营，把编辑出版

《烽火》看成是射向侵略者的子弹。他常常冒着日寇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到印刷局去发排，取校样。八、九千册的刊物出版以后，巴金和同事一起，亲手打包发行出去。生活虽是那么紧张、忙碌、辛苦，但巴金想到的是坚持战斗在文化岗位上，用思想的武器去攻击敌人。这就是自己作为战士的一种性格和职责。他说：

“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面临陷落的威胁，郊外的炮声已经隐隐可以听见了。日本侵略者越过东面的邻县增城正奔袭逼来。十九日傍晚，巴金匆匆忙忙赶到印刷局取到朋友章靳以（这时他已先离开广州）主编的《文丛》新的一期纸型，而由他主编的《烽火》新的一期虽已排字完毕，却还没有来得及制成纸型。这时，敌人马上就要到来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气氛是相当紧张的。巴金回到住所，眺望城市的上空，心里又一次升起一种苦痛和愤慨的悲情。书生空有一腔热血，又怎能改变国民党的昏聩和腐败，又怎能阻挡残暴敌人的进犯呢？

第二天黄昏，巴金和未婚妻萧珊、弟弟李采臣、朋友林憾庐等人，随身除了携带简单行李外，还带着《文丛》纸型，坐上一只木船，在昏暗的暮色中，听着寂寞单调的桨声，离开了这座已将变成空城的广州。就在他们离去的次日，广州陷落了！

他们辗转经过梧州、桂平、柳州，一直到十二月才到达

桂林。这里也并不安全，敌机照样不断轰炸。《文丛》纸型跟着他走过了粤桂的山山水水，这时在艰难的条件下，经过他殚精竭力，终于勉强出版了。他悲壮地对读者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

“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整个抗战期间，巴金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经常往返在桂林、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后方。战争期间，物资缺少，生活艰难，但他仍和朋友们坚持主办进步的文学出版工作。同时，自己又连续写了反映抗战生活的《火》三部曲、《还魂草》，描写抗战期间底层人民悲惨生活和畸形的精神面貌的《第四病室》，继续批判封建传统礼教戕害美好生命的《憩园》等著名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冬，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杰作《寒夜》，成为他艺术纯熟，思想深沉的标志。这部小说淋漓地描写了旧时代的黑暗和绝望，浸透了作者深沉的悲哀和愤慨，也预示着长夜已经逼近终点，旧的统治的末日已经到来。人们正在盼望着期待着温暖和光明的来临。

在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年的文学活动中，巴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多产作家之一，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作品多数是在困难艰苦环境中，依靠他的坚毅的意志和火一样的热情写成的。因为他有一种真实坦诚的写作态度。他说：

“我愿意它们(他的作品)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的憎恨。”

“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里呼喊的人的职责。”

“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因此，他的作品里尽管写了许多悲苦的故事，忧郁的情绪，但总是鼓舞人们去向旧制度旧势力作斗争，去争取美好的未来。他坚定地深信：“春天是我们的。”

四、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

巴金是一个感情真挚、重友情的人。文学界许多作家都与他结成挚友。他也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温暖和力量，把友情看成自己生命的不可缺少部分。他说：“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象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巴金说过许多关于美好的友情的话。他也曾慷慨给予别人以真诚的帮助，往往是为了文学事业的兴旺和发展。因

此，朋友们也以最诚挚的深情回报他。有一位著名作家说：我从年轻时就与巴金认识，并且信服他。我这一辈子所以没有走错路，是与把巴金的言行作为自己人生道路的参照有关。文学界正是这种互相扶持，患难与共的友情，才使这一代作家走过了艰辛坎坷的道路。

三十年代，巴金通过办《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认识、团结了一大批作家，特别是发现、促进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主持的刊物编辑部常常是这些年轻作者聚会的地方。他们送稿、会朋友、谈论国事、研究文学写作、倾叙各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这些刊物刊登了许多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作品，如鲁迅、郑振铎、丰子恺、王鲁彦等；也发表了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如何其芳、李健吾、丽尼、陈荒煤、曹禺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著名的优秀作家，但这里，却是他们文学事业的起点。

其实，当时巴金自己也不过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也正是他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文思泉涌，连续不断写出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但他却毫不吝惜地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默默无闻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他努力支持发现别个有才华有前途的青年作者，尽他一切的力量去促使别个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其中有许多还是与他根本不相识、完全不为文坛所知道的。

巴金和曹禺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最早为巴金发现、支持才得以在《文学季刊》上发表